

刘士林

著

现代诗论丛

XIANDAI SHICI LUNCONG

# 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士林

著

现代诗词论丛

XIANDAI SHICI LUNCONG

# 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

本书由中华诗词研究院资助出版



詩詞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刘士林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2

（现代诗词论丛）

ISBN 978-7-5622-7162-8

I. ①诗… II. ①刘…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5988 号

### 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

©刘士林 著

---

责任编辑：鲁 丽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胡 灿

编辑室：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737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280/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mailto: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266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8.5

版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46.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 出版说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新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样式被称为“旧体”，为主流文学史叙述所贬抑、排斥。承续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样式的现当代诗词，也长期被置诸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视野之外。于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的百年诗歌史，被简化为一部新诗发展史。事实上，传统诗词创作像新诗一样是个庞大的存在，现当代诗词缺席的诗歌史，不是完整的现当代诗歌史。

目前，当代诗词正处于一个由复苏逐渐走向繁荣的新时期，诗词创作队伍空前庞大，诗词组织星罗棋布，诗词刊物争奇斗艳，诗词作品汗牛充栋，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诗词评论稍显岑寂，现当代诗词研究与理论建设步履维艰，难以与蓬勃发展的诗词创作产生良性互动。近十多年来，这种局面才稍稍有所改变，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批现当代诗词研究项目，部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题也开始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现当代诗词研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陆续出现了部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中心把目光投向当代诗词评论与研究领域，致力于该类著作的出版，并获得广西桂平太平文化发展研究基金资助，成功推出了现当代诗词研究的第一套系列丛书“太平基金文库·诗词论丛”，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在此基础上，本中心继续推出“现代诗词论丛”。本论丛精选有分量的现当代诗词研究著作，先期四种包括陈友康《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刘士林《诗性文化的旧邦新命》、马大勇《晚清民国词史稿》、黄阿莎《沈祖棻词作与词学研究》。国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作为国家级研究机构，自成立以来，为推动当代诗词传承与发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此四种现当代诗词研究著作即由该院资助出版。我们将以此为基础，继续致力于此项出版工作，为推动当代诗词创作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相信集腋成裘，必有可观。

中华诗词出版中心

2015年12月



## 青春浩气想吴钩

### ——我的20年诗性文化理论探索之路（代序）

大约20年前，我提出了“中国诗性文化”的概念，认为美轮美奂、源远流长的中华古典诗词不仅是一种文学技艺或审美对象，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承载体系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真实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将诗性文化理论运用于美学、中国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领域，希望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源流、结构与功能，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新的解释框架。值此诗性文化理论提出20周年之际，我想结合个人的探索和认识过程作一个简要回顾，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纪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一点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 一 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

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探索与研究，起源于1990年、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诗哲论》，中间经过1994年、1995年的《中国诗学人类学》的完善，最终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诗性文化》中得到较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中，《中国诗哲论》易名为《中国诗学精神》，《中国诗学人类学》易名为《中国诗学原理》，但基本内容均保持未变。2002年以后，我又将中国诗性文化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写或主编有“江南话语丛书”（2002第1版、2008第2版），“诗性智慧丛书”（2005），《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07、2008、2009），《中国脐带：大运河城市群叙事》（2008），《江南文化读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论》（2010）等。20年



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与领域虽几经变化，对诗性文化理论、价值态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调整和补充，但以诗性精神与价值谱系审视、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伦理异化、现代西方工具理性和当代全球商业欲望的主旨始终如一。

关于诗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纯乎偶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在大学时有写诗的经历，同时很偶然地接触到与西方理性传统差异很大的维柯的《新科学》，特别是在后者“诗性智慧”的刺激与启发下，我几乎是在一种“诗意迷狂”的状态中偶然撞开了诗性文化之门。从最核心的“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到随意发散出的“不是历史学，不是道德哲学，而恰是古典诗学，才真实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国人的生命本体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说都是无法论证的诗性直觉产物。

门户既开，就为以后的探索与推进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际完成了《中国诗性文化》的写作，借助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早期人类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框架下，中国诗性文化的出身之谜和深层结构才日渐清晰和完整，并最终凝练为我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后来，我还经常用“思想芦苇”和“情感芦苇”来说明中西文化的深层差异——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

## 二 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

在对诗性文化的价值态度上，我也经历过思想上的曲折与反复。在



写作《中国诗哲论》前后的几年中，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和工业文明必胜的影响，尽管当时可能比现在更热爱古典诗歌和田园生活方式，但对中国诗性文化的评价与态度却相当悲观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国诗哲论》的“结语”中曾写到“诗性文化是一种较为落后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态”，这种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还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还会以《诗性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格格不入吗？》（《中华诗词》2009年第11期）一文赐教。但老实说来，这个观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时间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结构论》中，我提出一个健康的文明在深层应包括“真、善、美”三大观念或“科学、伦理、审美”三种“精神实践方式”，并将之对应于人类历史中的古代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消费文明，特别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现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年、1995年通过撰写《中国诗学人类学》（即2006年收入“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的《中国诗学原理》）而比较充分地了解到诗的起源与发展之后，我对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中心论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看作对立、互补的两大谱系，则是在1997年和1998年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期，通过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原始形态、历史源流、深层结构和现代价值的充分研究，这个关于诗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运的是，我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没有被时代抛弃，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病象横生以及现代工业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识到关于中国诗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远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价值以及思想文化资源意义。再后来，由于越来越明白包括中国诗性文化在内的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有两面性，所以我不再胶着于诸如“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诗性文化与现代社会是离是合”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而是以“与文化为善”的态度积极地“从建设性角度”推进中国诗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体说来，一方面是不断地思考和阐释诗性文化的本质与内涵，努力通过具体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





国诗性文化蕴涵的现代性价值。如提出在中华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诗化的感性”和“诗化的理性”，既不会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逻辑系统，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欢。另一方面则是努力探求诗性文化作为一种基础理论进入一些新的学术领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生活（如都市化进程研究）的可能与具体路径。我觉得这比早年那种空泛的讨论在实际上更有助于诗性文化的当代重建和复兴。以“诗化的理性”节制“消费生活方式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与无限扩张，以“诗化的感性”平衡“大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娱乐至死”，更是我经常强调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难美学》、2006年出版的《一个人的文化百年》，主题都是以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反省、检讨、批判西方以非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和以纯粹欲望为主题的后现代消费文化。所以尽管在表面上这与中国诗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与关切的核心问题上，却可以说与诗性文化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切都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麦当劳化、文化粗俗化的当今世界，实现中国诗性文化在当代的整体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艺复兴。

### 三 中国文化的的核心就是诗性文化的核心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与传统文化的利益与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近年来的都市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使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安全与可持续问题也有了一点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个演讲中，我提出一个问题：“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2006年《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另一个演讲中，我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答案：“因为与诗性文化一同消亡的，还有我们民族诗性的精神机能与生命本体，包括我们民族特有的诗性的感官、直觉、心理、思想与创造力。而与此同时，是我们在文明上与西方日益趋同，越来越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特



征。尽管我们仍在生产与创造，但由于从观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个现代生产过程就摆脱不了一个巨大的异化怪圈：我们越生产，我们就越缺乏；我们越创造，就越没有创造的能力。因为我们没有一件劳动成果可以与西方区别开，具有所谓的‘原创性’。这表明，一旦失去了诗性文化，我们就只能充当其他强势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们的意图去生产与消费。”

现在讲文化利益与安全的人物与言论很是不少，但我认为，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与真实精神的陌生，导致他们大都未能抓住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与需要。因为与其他古代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不同，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是诗性文化，这既是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所以说，中国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安全就是诗性文化的安全。从诗性文化出发，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诗性文化，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我们真实的存在以及表达我们真实的需要。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们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实的存在与需要了。当然，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应该了解科学、商业、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强调的是，未来世界绝不会是理性文化独步天下，而诗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类要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这个意义上，维护诗性文化的利益与安全，既是我们对中华民族应该承担的伦理职责，也是对人类文化必须做出的庄严承诺。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8日第17版，发表时有删节

# 目录

|                                            |     |
|--------------------------------------------|-----|
|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 .....                      | 001 |
| 《诗经·蒹葭》与中华民族生命情感的历史源流 .....                | 015 |
| 中国诗性文化的传承创新路径 .....                        | 028 |
| 中国文化精神的本体论阐释<br>——刘士林访谈录 .....             | 036 |
| 时代需要“诗性文化” .....                           | 048 |
| 中国诗性文化与都市空间生产 .....                        | 057 |
| 诗性文化与当代诗词的国家职责 .....                       | 064 |
| 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br>——刘士林教授在全国审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 | 074 |
| 在江南探寻中华民族的诗性精神<br>——刘士林教授访谈录 .....         | 084 |
| 齐鲁伦理文化与江南诗性文化 .....                        | 099 |
| 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 .....                      | 104 |
| 江南诗性文化研究方法的建构与探索 .....                     | 109 |
| 江南诗性主体与江南文化精神 .....                        | 118 |
| 建构江南城市研究的诗性人文学学术谱系 .....                   | 130 |
|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                            | 141 |
| 现代作家解读江南城市 .....                           | 161 |



|                              |     |
|------------------------------|-----|
| 无锡蓝藻事件凸显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   | 173 |
| 关于古诗阅读的一些散记 .....            | 182 |
| 关于唐诗精神的一些断想 .....            | 188 |
| 陈寅恪的“旧巢痕” .....              | 193 |
|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    | 208 |
| 现代学者旧体诗词中的学术与思想 .....        | 220 |
| 那个远去的放牛娃带走了什么 .....          | 233 |
| “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总序 .....        | 246 |
| 中国话语与中国情感                    |     |
| ——兼及当下先锋诗歌创作的问题与思考（代跋） ..... | 251 |
| 附录一 “中国诗性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新阐释 .....  | 259 |
| 附录二 诗性文化理论重要评价及评论要目 .....    | 279 |



## “诗化的感性”与“诗化的理性”

### —

“依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

这句诗大家应该不是特别陌生。它的意思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干，整天泡在诗的虚幻意境中，而不过是古代文人在科场失意之后的一句气话。但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句气话，如柳永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试想，在人生的理想与事业受到重创之后，一个读书人不是想着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不是在痛定思痛之后改弦更张，不是选择“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在异性的肉体与话语中排遣生命的焦虑与痛苦，甚至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疗救与慰藉，这当然是大有深意可寻的。如同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总是呼喊父母一样，在各种临界状态中，也最容易见出不同民族的精神本性。如果是德国人遭遇挫折，我想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正如恩格斯说他们在音乐中是“一切民族之王”。而中国古代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则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

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sup>①</sup>

---

<sup>①</sup> 刘士林著：《中国诗学精神》（“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一），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一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不仅在于生理基因，更重要的是文化基因的差异，如果说前者直接反映在肤色、毛发与体质上，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精神本性与文化传统。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如果说不同的现代民族对过去与未来必须承担什么职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防止人类文明走向同质化。在这个意义上，重提“第一功名只赏诗”，就是找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战线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诗性文化，我们就不可能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更重要的是，作为诗性文化的精神后裔，如果我们的身影失踪了，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承担这一职责。

自康德以后，任何传统大致都呈现出三副面孔，中国诗性文化也是如此。一是“知识”面孔，如孔子说读《诗经》可以“多识鸟兽之名”，如现代语文教育经常提到的“古代文学知识与素养”，这是诗性文化传统具有实用性之表现。二是“审美”面孔，是受西方文论中“情感表现”说影响较大的，也是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一副面孔，即古诗有审美功能，可以愉悦心灵。三是“伦理”面孔，它的大背景是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传统”。前两副面孔，分别带有实用或享受的性质，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而唯独“伦理”面孔，由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也不能给人带来愉快的享受，甚至本身还是一种相当沉重的负担，所以正在陷入深深的遗忘中。以至于人们经常会想：读不读唐诗与宋词，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有所谓的“诗性文化职责”，我想我们必须过的第一关，就是重新熟悉传统的“伦理”面孔。这可从“人的职责”与“中国人的职责”两方面来了解。首先是人为什么有“职责”，这必须回到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职责”誉为“好一个崇高伟大的名称”，它的特点在于“丝毫不取悦于人，丝毫不奉承人，而要求人们服从”，同时，这种服从“决不以任何令人自然生厌生畏的东西来行威胁”，也就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一件事情，做它没有任何好处，不做它也没有任何妨害，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做它吗？或者说，难道我们人性中还真有一种东西要求我们必须去做吗？康德说：有，“它



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只是人格而已”。这里关键是理解什么是“人格”。我们知道，人源于自然，人性的基础是生物本能，其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所以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一般人也同样是不愿意“劳心苦形”的。但由于在“趋利避害”中看不出“人”与“动物”有“类的差异”，所以人的各种自然属性尽管存在，却不能看作“人格”。用康德的话说，“人格”是“超脱了整个自然的机械作用的自由和独立性”的，它“凌驾于整个感觉世界之上”，是“他自己的理性所给予的纯粹实践法则的能力”<sup>①</sup>。对此加以引申，自然只为自身负责，动物扩大到其幼崽，甚至人的不少活动，也没有脱离利害关系的制约，而只有人类在其更高发展阶段上，才能对文化、艺术、诗歌等超功利的事物承担起“职责”。一言以蔽之，只有超功利的行为才体现了人性的本质。其次是对中国人而言，除了承担一般意义上“人的职责”之外，从出生的那一天起，我们对本民族文化就有传承与弘扬的责任与义务。而中国诗性文化作为这个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在所有我们应该承担的“职责”中无疑是“重中之重”。这当然不是排斥西方文化，而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中西文化谱系的理解：如果说，学习西方的目的是成为现代人，那么，承续传统的主旨则在于发展为现代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并足以应付生存挑战的情况下，还要花时间与精力去学习唐诗与宋词的根本原因。

## 二

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在于找到其根源，这是我们深入理解自身的传统，以及与其他文明进行平等对话与交流的大前提。以“诗性智慧”为核心，不仅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清晰肌理，也可以建构出与西方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在《中国诗性文化》中，我把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阐释为“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

按照维柯的天才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关于诗性智慧

<sup>①</sup> [德] 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94 页。



的概念，从源头上讲，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从现代意义上讲，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其具体内涵，用中国哲人的阐释，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的“一元论”。在人类发展之初，由于具有思考功能的理性意识尚未产生，所以在主体与对象、感性与理性之间也不存在任何的对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原始食物链在自然变化中突然中断，才终结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流的原始和谐关系。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直接摧毁了异常丰富的原始食物资源，在固有食物资源的再分配与新的“觅食”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界发生了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生活资料分配的激烈竞争，催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如果说前一个过程产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类本质”，那么后一个过程则直接催化出个体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古生物学的研究显示，物种的灭绝和变异都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链的中断，由此可知，人类的起源也是如此。但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其他古生物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如果说共同的问题是都必须改变食性与食谱，那么它们巨大的差异则在于人类的反应具有“对象化”与“主体化”的性质。前者意味着自然界成为“对象”，后者意味着人类自身成为“主体”，这两者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对立，使在原始诗性智慧中和谐的“天人合一”秩序走向崩溃，人类不仅不再依附于自然，相反只有通过改造与征服自然，才能生存与繁衍下去。这就是西方历史学家讲的“人类的精神觉醒”，并具体表现在希腊、印度、埃及与中国四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尽管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与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它们觉醒的方式与收获也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经历了这一历程之后，人类才开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与传统。

人类学家指出，原始民族的精神核心是“永生的信仰”。由于意识机能的极度不发达，他们不仅不能区分物我、个体与他人，甚至也不能区别开生与死，正如庄子所说的“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这个原始的精神系统被破坏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如何面对资源越来越紧张、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的大自然，他们不明





白，曾经极度慷慨的大地母亲为什么突然变得吝啬与残酷起来？二是如何应对生命内部异军突起的“自我意识”与“个体需要”，他们很可能更不明白，为什么原本朴素的内心世界在一天天变得工于心计与欲壑难填？前者是“对象”问题，后者是“主体”问题。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约产生了四种回应方式，一是全盘否定“对象”，如古埃及的“来世论”，认为这个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二是彻底消解“主体”，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学，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空”。这当然是两种最极端的反应。三是希腊类型，我把它的关键词称为“主体化”与“对象化”，这两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体逐渐发展为冷静的理性主体，而主体的日益强大则意味着人与大自然的原始有机联系日益走向解体。对于后者，大自然与人类的敌对关系的出现与不断升级，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斗争必定变得更加酷烈与无法调和。四是中国类型，由于诗性智慧在中国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同时也限制了生命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具体说来，它在肯定个体意识与需要的同时，又没有办法彻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遗留下的血缘亲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换取生活资料的同时，它又希望能够保持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时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希望不要“伤筋动骨”。与希腊模式相对，中国模式可称为“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希腊模式的要义有二：一是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二是宇宙裂变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那种冷酷地压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会生产方式，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中国模式不同，它一方面尽力消解生命内部逐渐展开的“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主体的欲望以尽可能减少人与自然的矛盾。希腊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它完全背离了人类最初的诗性智慧。中国模式是诗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继承了原始的诗性智慧系统。以后的中国文化，尽管层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诗性智慧为根底，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一种文化形态。

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